

孙中山与宋嘉树首次接触考辨

□ 沈渭滨

内容摘要 孙中山与宋嘉树首次接触于何时?居间介绍人是谁?接触的地点在哪里?这些都是研究孙中山与宋嘉树关系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考辨,1892年宋嘉树在陆皓东陪同下,在香港和孙中山首次接触,奠定了孙宋日后关系的基础。

关键词 孙中山 宋嘉树 陆皓东 香港

作者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1101)

孙中山与宋嘉树,既是志同道合、终身不渝的革命同志,又是结秦晋之好的翁婿。孙宋关系是辛亥革命史、宋氏家族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其中,孙宋的首次接触,不仅奠定了孙宋关系的基础,而且对宋氏家族的尔后影响和发展至关重要。以往由于资料限制,对此研究很不充分。本文拟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加以梳理,试作分析。

—

孙中山和宋嘉树的第一次接触始于何时?至今仍扑朔迷离。一般都认为是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时,途经上海留寓于宋宅,是两个人的首次会面。但是这一说法有以下几点难以解释:一、孙、宋人分南北、地隔千里,在素无谋面的情况下,孙中山怎么会贸然下榻于宋家?二、宋嘉树为什么在毫无思想交流、不知对方思想底细的情况下,能在自己家里接纳孙中山?三、两个人为什么在相处中能一见如故,如此投缘地畅谈?由此可知,1894年之说有很多难以说通的疑点。从情理上分析,只能在双方相互了解、沟通的情况下,才会有下榻宋家之举。所以断定两人首次接触于1894年,不合情理。

其实,根据孙中山自述,两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892年。这是孙中山于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晓生信中提到的。原文如下:“晓生兄: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之谈。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弟孙文谨启,即晚。”^[1]

这是一件研究孙、宋关系的重要史料,也是出自孙中

山手书的第一手资料。信写于1912年4月,所称“二十年前”,上推应是1892年,又曰“初革命者”,当属首次接触之谈,但信中没有提及接触的地点在哪里。信中对宋嘉树在上海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作了很高评价,并指出宋是以“从事教会及实业”的公开身份,“隐则传革命之道”的“隐君子”,是“不求知于世”的低调者。这样一份重要资料,没有引起研究孙宋关系的学者重视,只有少数人有所注意,实在是遗憾。

现在没有史料可以说明宋嘉树为什么在1892年会和孙中山有所接触。比较合理的解释,一是双方都是基督徒,宗教救世的信仰,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就读于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时,就已被基督教教义所吸引,如果不是因为哥哥孙眉的反对,他将接受洗礼。1883年,终于在香港和陆皓东等,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Charles R. Hager)牧师施洗,成了一名基督徒。1884—1885年,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时,曾一度想做宗教救世的传教士。喜嘉理牧师对此有详细记述。他说孙中山的传教之志极为坚决,“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老师矣。”^[2]在未能遂愿的情况下,转而学医,因为“医亦救人苦难术”,符合当时孙中山的理想。

宋嘉树出身于海南文昌一户贫困的农家。1875年被舅父带领离乡,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此行虽比孙中山1878年檀香山早了三年,但有趣的是两人离乡时,同是12岁的少年。宋到美国波士顿不久,即被送到古巴哈瓦那一家丝茶行当了两年学徒,这又与孙中山刚到夏威夷时,在哥哥孙眉开设的店铺做小伙计的经历相类。1877年宋嘉树回到波士顿,在舅父的丝茶行里干活。舅父正式收他作为养子。他想读书,却遭到养父拒绝。倔强的他,

逃到美国海岸警卫队缉私船上做了侍童。后来几经转移,于1880年接受了美国监理会宗教洗礼,皈依基督教,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最后,又本着宗教救世的精神到上海传教。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和宋嘉树不仅早年有着大略相同的经历,而且两人都是基督教新教的信徒。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虽然宗派繁多,但它的基本教义较之以教皇为绝对权威的天主教会那种墨守旧章、思想陈旧者迥然不同,属于革新和进步的宗教组织,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反对教皇对各国教会的强权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反对教会享有解释《圣经》教义的绝对权威,而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强调教徒直接与上帝相通,无须由神父作中介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自由的倾向。虽然随着时间推移,教义在各宗派的宗教传播中有所变化和交叉,但新教上述原教旨精神仍大体相承,基本不变。正是因为宗教旨趣相同,成了促使孙、宋相聚的首决条件。

二是两人都有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共志。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期间,不仅被基督教教义所吸引,而且深受夏威夷人民反美斗争的感染,生发出救世济人、关怀祖国命运的崇高之想。后来,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3]

但是究竟如何“改良祖国”,用什么手段去“拯救同群”,孙中山还不甚了了。1883年他到香港求学,不久就经历了中法战争的刺激。他受到香港爱国同胞抗议法国侵略的正义行动感染,看到清政府签订和约的可耻结局,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他觉得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实在是中国积弱落后的根源,非除去不可,于是“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应时而生。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4],“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5]。“决覆清廷”,标志着孙中山原先“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理想由朦胧变得清晰,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才能达到目的,至于“创建民国”,那要到后来参加反清革命的实践时,才有对未来新政府模式作理性思考。撇开两者时序上的先后,1885年后,孙中山成了一个反清革命论者是无可疑的,他的政治觉醒时代已经到来。所以,从1887—1892年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即雅丽氏医学院时,他和同学好友课余畅谈反满,放言无忌,被时人目为“四大寇”。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这四年的大学时代,是他的“革命言论时代”^[6]。

宋嘉树虽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也是个关怀祖国命运、渴望国家富强的热血青年。他早年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波士顿,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光荣传统,被誉为美国革命的摇篮、独立自由的象征。正是在波士顿革命历史和林肯独立精神的感召下,宋嘉树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国家独立,民族革命”的朦胧意识,产生了“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想法。从此,他一直心系祖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1881年,宋嘉树进入美国“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后来的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读书,据《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传》一书所记:有一个参加过1884年欧洲革命,自称“革命军上士伊连”的老人,向宋嘉树介绍欧洲革命时,宋马上联想到中国,向他请教“中国应该怎样革命”^[7]。1884年中法战争时,宋嘉树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听到有人发表鼓动法军侵华演说时,立即提出抗议,责问演讲者:“先生,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你是弱者,是受侵略者,你被强者欺凌,被侵略者蹂躏,也会这样手舞足蹈,引以为荣吗?”法国“像当年凶残的不列颠人侵略北美一样,蛮不讲理地侵略中国。他们这样伤天害理、不顾廉耻、不怕舆论谴责,难道也是诵读《圣经》的教徒,也是信奉上帝的儿女”^[8]?义愤之下,宋嘉树自制了一块标语木板,上写:“请捐款给遭受野蛮侵略的中国”。他对那些反对者说:“上帝给我的神圣使命,就是唤醒他们,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指导他们。落后、愚昧、黑暗都是暂时的。强大的中国一定会诞生,到那时谁都不敢碰她!”^[9]上引宋嘉树的这些话,由于作者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而且全书带有明显的文学描写色彩,不足作为可靠史料予以采信。但考虑到作者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史学工作者,自称写作本书前曾广泛查阅了国内外各种报刊、档案,力所能及地访问了宋家亲友并加以考订核实。所以虽不可尽信,但相信不是杜撰。笔者在宋嘉树早年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不得已录而用之,借以勾勒出宋嘉树早年思想的大体脉络。通过上述话语的语境,说明这个根植于祖国的青年基督徒,也是一个关怀国家命运,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者。如果这一判断不错,那么1892年两人首次接触,就有了大体相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语言,如此才能出现如孙中山所说的“屡作终夕之谈”之事。

二

在解释了1892年宋嘉树和孙中山首次接触的思想基础之后,存下的问题就是两人接触的居间撮合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接触?

撮合人毫无疑问应是陆皓东。陆皓东,名中桂,号皓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是孙中山的同乡和村塾学友。两人关系亲密,都有改革弊政和改良乡政的愿望。1883年7月,陆曾协同孙中山捣毁村中北极神庙偶像,

为村民所不容，与孙中山同时离村去香港。年底，偕孙中山在香港同时接受喜嘉理牧师的洗礼，加入基督教。1884年到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

上海电报学堂创立于1882年，是一所培养电报专业人才的中等技术学校。校址初在胡家宅会香里（今福州路西藏中路东南转角处），后移到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上海电报总局内。学生最初仅20人，主要学习收发报技术，学制不定。学优者派至上海电报总局任职，缺额陆续考补。后因急需电报人才，学堂规模扩大，先后添设测量塾、按报塾、额外塾。1910年与上海电报高等学堂合并，移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陆皓东1884年入校学习时，学堂创办不久，学了几年，何时毕业，史无明文，只知毕业后派至上海电报总局充领班生。

宋嘉树于1890年由“巡行传道”转为“本处传道”后，在上海定居下来，住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桥（今虹口东余杭路）一带岳父家里。其间，执教于慕尔堂的主日学校，并热心组织“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

现在没有确切资料说明陆皓东何时结识宋嘉树。值得注意的是宋嘉树执教的慕尔堂主日学校，恰与陆皓东供职的上海电报总局，同在郑家木桥一带。慕尔堂建于1874年，原为纪念美国堪萨斯州基督徒慕尔死去的8岁女儿，由当地信徒捐款，在上海建立的教堂。不久，“圣三一”并入，成为基督新教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差会的重点教堂之一。陆皓东既是新教信徒，慕尔堂又在上海电报总局附近，他要做礼拜，很可能就在慕尔堂。那么，与执教于该堂主日学校的宋嘉树相遇相识，并非没有可能。这虽是推测，但合乎情理。由于两人志趣相投，成为互可信赖的朋友。据说，陆皓东成了宋家的座上客，两人在客厅里经常长时间晤谈，主题总是围绕着怎样才能使中国尽快富强和如何结成中国的“自由之子”社展开。时间是在1890年宋嘉树在虹口东有恒路建了宅第后，不过，宋何时建私宅，至今还未查明，这一说法不足以定论。但陆、宋相识交往，至迟不会迟于1892年。比较肯定的应是1890年宋嘉树在上海定居后，到1892年陆皓东偕宋嘉树南下和孙中山接触之前。陆、宋交往过程中，陆皓东势必会向宋嘉树谈到同乡好友孙中山，激起了宋嘉树想一见孙中山的欲望。如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于1895年从陈少白处获知孙中山革命志向后，急着要会见孙中山那样。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是他凝聚同志和朋友的磁力场。

陆皓东与宋嘉树之所以选在1892年南下，没有具体作证的史料，但可以从若干蛛丝马迹中寻绎出比较合理的解析。据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捕后陆皓东自撰供词：“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

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10]这段供词，值得注意者，一是陆皓东因自觉在沪碌碌无所就，乃由上海离职返粤；二是访孙中山于客寓，畅谈竟夕；三是双方经“连日辩驳”后确立宗旨，成为两人“倡行排满之始”。根据第三点“倡行排满之始”，可以推知两人畅谈必不在“今始返粤”的1895年，而应在此之前。若以孙中山回忆作证，两人畅谈革命排满的时间，即陆皓东由沪返粤，至迟当在1892年。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回忆他在香港西医学院求学时期（1886—1892）倡言革命时的情况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11]

文中提及“上海归客”陆皓东，证明陆并非如其供词所称，在1895年“今始返粤”，“恰遇孙君”，早在1892年前就已从上海回到广东，并去香港孙中山寓居的杨耀记店铺楼上，与孙中山、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四大寇”畅谈革命。这就是陆皓东所说“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的真实历史背景。他故意把时间延后到举行广州起义的1895年，显然是为了保护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革命同志。

既然陆皓东与孙中山畅谈反满革命应发生在孙中山就读大学期间，那么何以遽断在1892年呢？根据就是前揭孙中山致李晚生信中称：“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语，不是一个模糊的约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读。如果认定宋嘉树是在陆皓东居间介绍下与孙中山首次会面，那么，根据陆皓东供词和孙中山致李晚生信以及孙中山自撰的《有志竟成》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孙、宋、陆三人“初谈革命”的时间是1892年。

三

孙中山、宋嘉树、陆皓东三人首次相聚、“初谈革命”的地点在哪里？有一种说法是在广州。日本学者久保田博子在其论文《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中称：“1892年陆皓东由上海到广州，与孙文等革命同志有过来往。……宋嘉树去广东，通过陆皓东与孙文联系是有可能。”^[12]应该说这个推论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因为，据孙中山大学同学江英华回忆：1892年孙中山在西医学院毕业后，曾经香港总督罗便臣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孙中山与江英华两人“学识优良，能耐劳若，请予任用”。李

鸿章同意两人来京候缺。孙中山偕江英华在业师康德黎陪同下到广州向两广总督衙门申请领牌,然后晋京。此事虽然未能实现,但孙中山确实到过广州。那么孙中山在广州相遇陆皓东、宋嘉树的机缘,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是,广州是清政府管辖的华南重镇,禁烟森严,缙骑密布,要在广州畅谈反清排满革命,而且“屡作终夕之谈”,毕竟危险太大,尤其在孙中山、江英华去广州是为了向两广总督申领牌照,以便晋京就职的境遇下,与陆皓东、宋嘉树在“客寓过访”、“畅谈竟夕”,似乎不合情理。因此在广州相聚的可能性不大。

相比之下,三人相聚很有可能是香港。理由如下:

其一,1892年中外关系相对平静。香港是英国殖民当局管辖之地,清政府权力所不逮,言论较内地相对自由,人员往来聚合,亦不易引人注目。这是天时、地利方面的条件。

其二,孙中山自1883年到港,至1892年大学毕业,居香港几近十年,人际关系网络早已形成,结交者除同学、同志外,举凡学界如业师康德黎等,商界如辅仁文学社杨衢云等,政界如香港议员何启等,宗教界如区凤墀牧师等,在在皆是,比之广州人生地不熟要优越得多。接待朋友,高谈阔论,自在情理之中。这是人和方面的条件。

其三,大学时代,孙中山自称是其“革命言论时代”,所谈、所怀、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说明他与志同道合的学友间相互砥砺、尽情鼓吹,已经到了“无所忌讳”的阶段,他的反满志向已经坚定不移了。陆皓东作为“上海归客”,宋嘉树作为陆皓东的朋友,在香港参与倡言,正是躬逢其时。这是相聚的最佳机遇。所以才有《供辞》所云:“风雨连床,畅谈竟夕”,“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也使孙中山念念不忘,以致20年后仍使他“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之谈”。可知1892年在香港,孙中山、宋嘉树、陆皓东三人“初谈革命”,对孙中山印象之深。

从以上天时、地利、人和、机遇几方面分析,笔者认为,孙中山、宋嘉树在陆皓东居间介绍下首次相聚的地点,极有可能在香港。具体说,极有可能在香港杨耀记店铺楼上孙中山下榻之处。这个地方,不仅是孙中山大学读书时代常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倡言排满,大放厥词之所,而且也是他毕业后悬壶澳门时,仍下榻于此的寄寓所在。

还有一个问题,宋嘉树为什么在1892年随陆皓东南下香港?据上文分析,除了他早已渴望国家富强、改良祖国的一腔热忱,通过陆皓东介绍,想见孙中山的愿望外,一是陆皓东恰巧在当年离职返粤,与陆同行,得以面见孙中山自在情理之中;二是宋嘉树或许另有需要,借此机会与陆南下,显得更加自然。“或许另有需要”,是指他为筹办印刷厂,需要订购有关设备之事。

众所周知,宋嘉树自1890年改为“本处传道”后,便在上海定居。不久在虹口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购地建房,并在自家地下室创办印刷所,为上海美华圣经会代印《圣经》。宋氏新宅建于何年,本文上述第二节已经说明至今尚未查明,宋嘉树何年在其家地下室办印刷厂也没有确切记载。这对宋氏早期经历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也留给后人一个思考探索的空间。据宋嘉树在美国范德比尔特神学院就读时的同学和挚友步威廉(William Burke)的儿子詹姆斯·伯克所著《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所记,1896年,宋嘉树“在虹口新居接待步威廉”,可知宋氏虹口新居,至迟在1896年已经落成。在此之前(即1890年在“本处传道”后)应该住在岳父倪蕴山的家里。倪蕴山于1889年已经去世,倪府成了宋嘉树及其妻子倪桂珍(倪家长女)、倪桂珍妹妹倪桂金和夫婿牛尚周共同居住处。按照长幼次序的传统,把1890年至宋氏新宅落成前的倪府,说成宋嘉树家,也无不可。这样,所谓“在自家地下室里开办小型印刷厂”^[13]一语,就成了一个模糊而不确定的说法,它既可以指新建宋宅里的地下室,也可以理解为1890后宋嘉树夫妇居住的倪府。

在上海定居两年后的宋嘉树,深感执教于慕尔堂主日学校及服务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薪金微薄,又得到上海美华圣经会委托代印《圣经》的机缘,决定开设小型印刷厂。办印刷厂需要机器,因为传统的木板刻印,既不合委托方印制《圣经》的要求,又需要人力、资金投入,显然势不可行。传统的石印技术,虽然资金投入不多,但不合委托方要求。美华圣经会印刷的《圣经》都是铅印本。于是只有购置印刷器械才能实现办厂目标。可是19世纪末,上海还没有制造印刷器械的工业企业。当时,所有教会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益智书会、同文书馆等使用的铅字印刷机,都购自外洋。宋嘉树要办厂印制《圣经》,只能向国外订购器械。香港是内地与海外沟通的要地,许多外国企业都有分支机构在此办理业务。宋嘉树在结识陆皓东之后,既欲一见孙中山,又得知陆皓东有离职南下的企图,加上原有去香港订购印刷器械的需要,于是欣然与陆皓东结伴南下了。笔者的这一分析,虽然没有具体史料佐证,纯属推理,但由于存在无可否认的前提,即1892年他与孙中山、陆皓东首次相聚以及宋嘉树曾在自家地下室办小型印刷厂印制《圣经》的史实,这样推理,也就合乎逻辑了。历史研究在没有确切史料,一片空白的前提下,只要有确切无误的前提,是可以也允许进行合理推论、分析,得出结论的。这个结论,虽有待日后发现的新资料作检验,但它不失为试图解析疑团的一种方法。这就是所谓形式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综合上述分析、论证,可知1892年宋嘉树在陆皓东

陪同下,在香港与孙中山首次相聚,畅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宋首次交往,奠定了日后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的坚实基础。从此,宋嘉树在“从事教会及实业”的掩护下,“隐则传革命之道”,成为一个对上海辛亥革命作出贡献而很少为世人所知的革命“隐君子”。

参考文献:

- [1]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342、359.
- [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4.
- [4] [6] [11] 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229、229.
- [5] 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59.
- [7] [8] [9] 于醒民、唐继元.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49、67、68.
- [10] 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29.
- [12]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3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4.
- [13] 宋庆龄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4.

编辑 杜运泉



图为宋嘉树(中排左)与夫人、子女合影 唯先供稿

“和谐文化与文化创新”暨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闵行区党校召开

7月3日下午,“和谐文化与文化创新”暨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中共闵行区党校召开。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王邦佐,市社联秘书长生键红,市社联学会处处长郝德良,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夏军,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党校常务副校长陆明,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吴解生、周尚文等领导与来自上海党校系统、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高校的专家、教授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探索与争鸣》、《党史与党建》、《党政论坛》、《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杂志的领导和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全体会员,共2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会长吴解生同志主持。

在纪念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闵行党校常务副校长陆明、市委党校社科教研部主任袁秉达、《解放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周智强及市社联学会处处长郝德良四位同志,纷纷致辞,回顾了学会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向学会成立三十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期望学会的明天会更加辉煌。随后,学会两位会员代表作个人发言,倾诉了学会在他们个人成长历程中的激励与扶持。学会会长夏军同志表示学会发展的三十年历程,是一个发展共赢、开拓创新的过程,是每一个会员潜心向学、积极探索的过程。我们在回顾学会辉煌过去的同时,更应该将目光放远,为学会更好的明天

奋斗前行。大会还向获得“我与学会”优秀征文奖和“学会工作突出贡献奖”的同志,颁发了证书。向全体与会者颁发了研讨会论文集《时代的选择》。

在随后的“和谐文化与文化创新”理论研讨会上,闵行党校常务副校长陆明致欢迎辞,他表示,在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三十年之际,党校与学会联合举办“和谐文化与文化创新”理论研讨会,是为了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点上,充分认识进一步推进和谐文化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会者围绕新时期和谐文化的内涵与实践,文化创新的使命和意义,途径和模式的摸索与创新等内容做主题发言,他们的发言观点独到。在自由发言环节中,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营造了研讨会热烈、浓厚的学术氛围。副会长周尚文、吴解生对研讨会的发言作了点评,认为构建和谐文化与推进文化创新是我们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探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江莉莉)